

## 文化间对话：以中欧论坛的经验为例

[法] 皮埃尔·卡蓝默

陈力川 译

1996年诞生的《跨文化对话》丛刊，源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与乐黛云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的一个联合创意。丛刊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同中国合作的各个阶段紧密相连。第23辑对话专号有关于第二届中欧论坛的报道。本文分四部分回顾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全面介入中欧对话的历程：

1. 自2003年基金会确定新的大政方针以来与中国合作关系的发展；
2. 跨文化对话对每个社会内部对话的贡献；
3. 梅耶基金会的行动是否与其抱负相称；
4. 《跨文化对话》丛刊的前景。

### 一、自2003年基金会确定新的大政方针以来与中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与中国的合作，更确切地说是与不同的中国对话者的合作，始于距今二十年前。初始的目的是在198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帮助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参与世界对话。我们的行动先于后来事态的发展：无论是否愿意，中国的强盛将使她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必须为这一时刻作好准备：走出一个闭关锁国的时期，将自己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今依然如此，因忙于解决其内部问题而将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推后）。

我们从一开始对《跨文化对话》丛刊的支持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我们对中国和欧洲地方官员的对话，以及其他合作项目的支持同样出于这一想法。我们还

邀请一些中国人参加世界社会论坛，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共同体的雏形。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我们坚持邀请了许多中国人参加2001年12月在里尔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迄今为止，这次大会仍然是回应我们的社会之间、人类和生物圈之间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建设世界共同体之必要性的美好象征。

此后发生的一切显示了这一双向开放的重要性，表明了处于文化和经济不同发展水平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面临同样的挑战。梅耶基金会自2003年开始实施的新的的大政方针直接来自世界公民大会的结论，特别是这次大会结束后付诸实施的“21世纪日程表”。这个日程表确认人类社会虽然处于不同的背景，但是面对三个最重要的挑战：一是治理革命，即为了应对问题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的变化，我们有必要重新深入思考我们社会的管理；二是伦理，为了共同管理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我们需要超越哲学和宗教的不同传统，对一些共同的原则达成共识；最后是改变发展模式，现在支撑中国的发展、以前支撑欧洲发展的这种模式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死胡同，它每日每时都在加剧人类与生物圈的不平衡，如果我们不及时在自身找到深刻变革的能力，这种不平衡可能将是致命的。

新的大政方针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我们在中国的合作关系，但是至少使其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与此同时，来自中国方面的要求也有所变化。我想特别提到与我的朋友陈越光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21世纪初，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开放，如果不是已经完成，至少是正在进行，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使用，学生和游客的流量，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来衡量。因此，我们对基金会在这方面的需要比十五年前要少。相反，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在其发展模式和中国社会以及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之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我们急需与我们的朋友一起思考必要的改变。”

显然，这些改变与我们的三个方向有关：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条件，同时重新思考治理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遏制地方和省级政府庞大的胃口，还是更好地协同管理水的问题，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为实现量的发展而采取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挑战。此外，中国的崛起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个人和集体行为之基础的伦理问题。

无论是2003年以来我们在中国建立的合作关系，还是延续下来的老的合作关系都带有这些变化的印记。例如我们与陈越光在2005年发起的北京治理论坛。第一届治理论坛的主题涉及治理的普遍原则，2007年11月结束的第二届治理论坛的主题是NGO的治理以及NGO的社会责任。